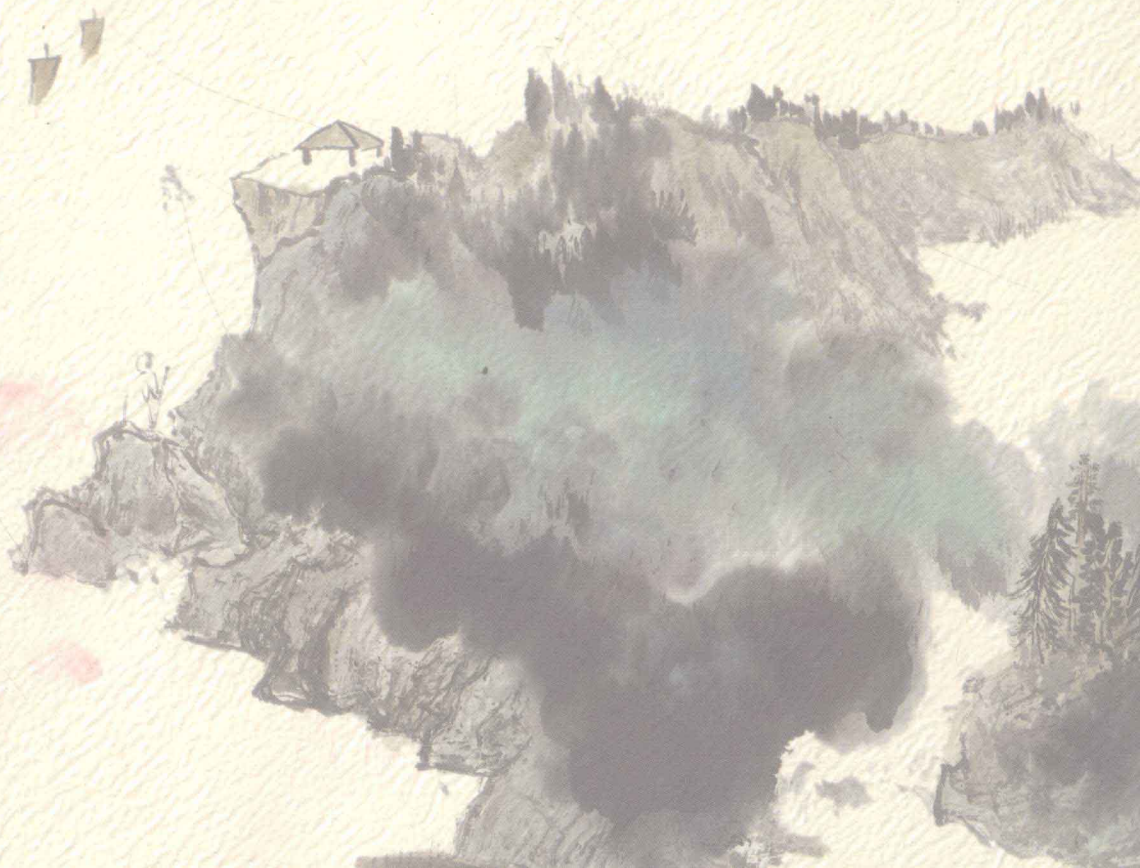


杜圣修◎著

我存在 我思索

——杜圣修文集

Wocunxai Wosisuo



我存在我思索

杜圣修文集

杜圣修◎著



责任编辑:陈 恩

装帧设计:贾德铭

我存在 我思索

——杜圣修文集

杜圣修 著

印 刷 哈尔滨天兴速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80 千

出版日期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前言:63 岁时的自画像

杜圣修,字子超,乳名志超,小超,男,汉族,山东黄县城南邵家村人。出身富农。生于1938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六。196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哈尔滨外专任教,1971年,该校与黑大合并,同时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1999年12月退休。现代文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民盟校委员会委员、副主委。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理事,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942年春5岁入本村初小。6岁时因患瘟病(伤寒),几乎一命呜呼,因而辍学七八个月之久。大病初愈,又赶上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兵荒马乱,又被迫失学在家半年多。在此前后,正值家乡闹土改及土改“复查”,学校也跟着停课闹革命。这次失学也有6个月上下。本应4年的初小,我则断断续续念了6年多的岁月。1950年夏升入距家2里的大脉张家完小,1952年7月毕业。连续两年报考初中都名落孙山。事后知道,出身富农的我,按当时招生的政治标准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有东北技工学校到家乡招生,地富子女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从此我不敢奢望进什么中学念书,只想进城当一名工人。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正大张旗鼓地进行工业化建设,当一名工人又何其荣耀啊!雄壮有力、激情四射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是当时最风行的歌曲。然而,在家乡,我的志向却永远只能是做白日梦!

于是,在走投无路中,我母亲挖空心思,广泛去信央求城里亲友伸出援助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音信皆无的八舅舅,从哈尔滨来信了,说他在沈阳的儿子——我未谋面的二表哥,正在开油漆涂料行,如果愿意可以去他那儿。于是1954年春节刚过,选定一个黄道吉日,我便启程直奔沈阳,终于可圆当工人的梦了!谁料到沈阳不久,当地派出所警察就不断查户口,对于近期盲目流入者动员其回乡。二表兄可真“有才”,想出了如此奇妙对策:去哈尔滨!这样,迁移户口的文件上原居住地一栏,就很自然填“沈阳市”了!于是,我来到改变我人生道路、命运的恩人——八舅舅家。表兄对策还真有效:来哈后果然因为我是“沈阳人”,没人再撵我回山东老家了。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在哈市当工人了!可谁能料到,我当时实足年龄不到15岁,用人单位到劳动局办备案手续时,因此遭拒



绝。于是，我的当工人梦就这样又一次破灭了。

被逼无奈，舅舅说：“先试试考中学吧。如果真考上了，中学毕了业，身价就不一样了，就不用当工人了，当个职员什么的。”于是，我就成了一名初中生。报考初中填表时，家庭成分一栏，我竟胆大妄为填成“中农”。不知顺利录取是否与此有关。在反胡风肃反运动中，大哥闻此大动肝火，逼我对党要忠诚老实，向组织坦白。并威胁我说：“你不主动坦白，我马上就写信向你们学校党组织揭发你！”根据我对大哥为人的了解，他这种大义灭亲之举，肯定不是说说而已。无奈，我只好如实交代，深刻地做了检查。不料组织只是批评一顿而已。这事对我的前程似乎并未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初中毕业，被保送上了全市最有名的哈尔滨四中。据说，四中在解放初期是东北重点校哪！三年高中，毕业在即，传说我早就被内定为留苏预备生人选之一。在初中我就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高中阶段，曾担任校团委委员、团委宣传部部长。政治上，热情极高，靠近组织；思想上，唯党的意志是从，党说啥就是啥；行动上，更是党指哪儿打哪儿，叫干啥就干啥。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公认我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当时我想，即使留苏不成，上个理想大学不会有问题的！然而，不久我隐约感到事情不妙。反右后大家对政治特别敏感。果然，高考录取工作接近尾声，我仍然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和我同样命运的当然不止我一个。最近《炎黄春秋》载文披露：高考政审不合格者被打入另类者，名曰“不宜录取”。当时我蒙在鼓里。然而，结局既不是悲剧，也不属喜剧，而是正剧：最后被黑龙江工农师院录取。这所学院，刚刚成立，专门为工人农民接受大学教育，培养教师。它是在省工农速成中学基础上筹建的，是教育大跃进的产物。1961年1月与师大合并，我有幸成为该校的中文系学生。

在工农师院开学不久，我居然被任命为团支书。为了掌握全班同学的出身和背景情况，以便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校团委书记把全班同学档案悉数交给了我，其中包括我本人的！据说这是违背组织原则和规定的。强烈的好奇心，怎么也遏制不住窥探的欲望。于是我屏住呼吸，伴着剧烈心跳，像初试身手的贼，匆匆把它浏览了一遍。天哪！一看高考成绩单，我惊呆了！我的4科总成绩高达340几分，平均在85分以上。俄语是97分。按这样成绩，我报的志愿北京师大、东北师大，应该毫无问题。其他同学一般比我少100分左右，个别人少到总分不足200分！天哪！再看我的档案，足足有一寸多厚：原来几乎全是我1958年当右派的大哥全部档案的克隆版。为此至今仍钦佩烟台市教育局那位人事干部，竟然如此不惜精力，不厌其烦地抄写如此冗长的材料（其中包括我那位愚忠的长兄，当右派的全部交代材料，同事们的揭批检举材料，组织上对长兄的亲属外调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我家主要问题有：一、出身富农；二、长兄是右派分子；三、母亲是戴帽的富农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后天道点传师；四、三反运动中，我的伯父、三叔、四叔、五叔、六叔都属“不法资本家”；五、众多主要亲属都是地



主、富农。看了上述材料,我当时是浑身发热,头脑胀痛,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记得开学不久,中文系主任张松泉教授曾郑重而又诚恳地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指出:他曾细看过我的档案,但仍竭力主张录取我。他说:“你家庭确实问题挺多,而且很严重。党的政策是更重视现实政治表现,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一定能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张教授的话,至今犹言在耳。对他本人我永远心存感激,这成为我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之一。特别是当时他力排众议,让这样家庭出身,其成员和亲属中有这样严重问题的我,获得了上大学的权力和机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但是,我也由此开始被家庭问题的浓重阴影笼罩。“文革”中,我对遇罗克的《出身论》由衷赞同,拥护,叫好!他为我辈政治贱民,争取平等做人的权力,是大爱至善的义举,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应该永远彪炳史册!不过出身对我来说,虽是沉重包袱,但也时刻提醒我,自身不适合搞政治,应把精神用在“专”上,于是订正了以往的做人之道。我和许多同辈人相比,资才实在乏善可陈,居然在学业上取得些许成绩,或许与此有关吧。大学四年中,我的22门考试课成绩全部为“优秀”,这在全年级180多人中,仅有两个人而已。

学生到教师,身份虽然转换,但依然未离学校,仍旧书生本色。我从读书中,得到无穷乐趣,在教书中,我的心灵得到不断净化、升华,永葆青春。我庆幸自己选择了教师这一“角色”,得以在学校这个舞台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演出。我乃教师世家,当教师乃是继承父业。我女儿也是教师,算是继承祖业。愿我那忠厚仁爱的老爸,在天之灵因此而欣慰、自豪!

从教36年中,先后讲授写作、现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周氏兄弟研究、郁达夫研究等课程。我认为,大学老师应视学生为朋友;教学应是心灵对话;大学教育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富有个性的人。为此,教师首先要努力成为这样品格的人,力争为学生树立这样的人格范型。教学中,我力图实践上述理念。讲课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富有创见和启发性,受到学生的欢迎、好评。多次获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自70年代中期起,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化思潮与文学以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研究。先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编《鲁迅文集》(12卷本)等。在国家及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40多万字。其中多篇在全国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为同行所关注。这些文章是:《试论阿Q性格的思想根源》、《“尚是食人民族”的先觉者的悲剧》、《〈阿Q正传〉的文体特征及其解读方法》、《〈沉沦〉:选择的困惑》、《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鲁迅、周作人“失和”原委探微》、《“尚是食人民族”的自我超越》、《“五四运动”:被阐释的与被遗忘的》。论文多次获校科研奖。《试论阿Q性格的思想根源》一文获1984年省社科优秀成果五等奖,《关于“打倒孔家店”的若干史实的辨正》一文获1992年同项二等奖。



回顾起来,自己执教大学凡36年,以至于忝为教授,实在是匪夷所思。如前所言:我出身富农,为逃避山东老家的阶级歧视,独自闯关东,想到城里当一名工人。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盲流”。因年纪小,找不到工作,才被迫走上了读书求学之路。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念完了初中、高中、大学,又糊里糊涂地走上大学讲坛。几十年来,虽然“唯成分论”的盛行,自幼年起便使我在人生道路上遭受种种歧视与挫折,给我的精神带来无穷的压力与痛苦,但这并未妨碍我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自七八岁起,我便对党与领袖充满崇信。1957年之后,我便自觉地以“驯服工具”来自律、自醒、自塑。60年代以来,则更是虔诚地以党的意志与领袖言论为是非与价值标准、做人处世的准则。

年近不惑,经历了80年代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方悟如此浑浑噩噩活法的荒唐与可笑,并认识到这实际上是这个时代民族灾难深重而频仍的最重要的思想与文化根源。由此逐渐领悟到做人的根本是“成为你自己”(尼采语),因而颇为仰慕、向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语)的生存境界;在治学上,则常用“我思索,所以我存在”(笛卡儿语),“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语),“思想本身就是自己的舞台,也定义着自己的存在”(狄金森语)之类名言自勉,并把晚年顾准视为这方面的楷模。自认为,近20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作文,乃至为人,都是在力图实现这种新的活法。

作者附识:2001年是黑大60周年华诞。校庆筹委会决定出版《黑龙江大学学子风采录》,要求凡入选的老师,都撰写一篇介绍自己的短文。内容包括:除介绍自然情况外,还要写本人主要经历、教学和科研主要成绩和获奖情况,以及人生感悟,自己喜欢的格言,对学校的希望、建言等。拙文的最后4个自然段,就是为应该书所写“风采”主要部分。近来,偶翻此书,发现入选者都是写自己当老师后,在人生舞台上的表现(与该书的主旨有关),而且写得流于简约化,雷同化了。如著名作家弗斯特所说的“扁”的人物。其实教授“面具”后面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果人们按书中提供的信息为其画像,他本人看了也会感到陌生。这就是我写拙文的缘由。黑大60年校庆,恰是我63岁之际,故取名曰《63岁时的自画像》。

杜圣修

2008年7月24日



作者于 1989 年 11 月摄于颐和园



目 录

前言:63 岁时的自画像·····	(1)
-------------------	-----

第 一 辑

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	(3)
“五四运动”:被阐释的与被遗忘的·····	(10)
关于 30 年代文艺运动·····	(27)
关于抗战初期的两次文艺论争·····	(78)
“战国策”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 ——对“战国策”派的新解读·····	(83)
略论 40 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成绩和局限·····	(88)

第 二 辑

关于科学地研究鲁迅的若干问题 ——鲁迅工作的教训浅论·····	(95)
鲁迅的生平、创作与思想·····	(110)
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	(143)
“尚是食人民族”的自我超越 ——《狂人日记》的人类学阐释·····	(146)
众说纷纭论阿 Q·····	(162)
阿 Q 精神与中国传统思想 ——关于阿 Q 性格思想根源问题的探讨·····	(168)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鲁迅《阿 Q 正传》·····	(206)



论《阿Q正传》的文体特征及其解读方法	(209)
假洋鬼子形象辨	
——与有关同志商榷	(220)
“尚是食人民族”的先觉者的悲剧	
——《药》的主题新解读	(232)
鲁迅、周作人“失和”原委探微	(244)

第三辑

郁达夫的生平与创作	(257)
《沉沦》:选择的困惑	(267)
《春蚕》的思想与艺术	(276)
具有独特风格与韵味的“美文”佳作	
——谈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	(279)
独到而有价值的探索	
——程仁章著《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论集》简评	(282)
生存困境的正确人生选择	
——我对《有这样一个支部书记》的解读	(286)
关于吴光宇被阉割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290)
语言的穷拙	(297)

第四辑

《狂人日记》新解读	(301)
目录	(301)
前言	(301)
第一章 小说研究之鸟瞰	(303)
第二章 小说的时代	(326)
第三章 小说的作者	(374)
第四章 小说的艺术与思想	(413)
结束语	(476)
后记	(481)



「第一輯」



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同期的革命史、中共党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的论文、专著中,每每要论及五四时期的所谓“打倒孔家店”的问题。笔者发现,这些论著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十分流行的说法,往往与历史史实并不相符。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与史实相左的说法,有的是出自某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权威学者(如张岱年、侯外庐、胡绳、胡华、蔡尚思等)的著作,有的甚至见诸亲历五四运动人士的回忆录中。五四运动距今已经七十年了,不仅当年的老一代人物早已作古,即使那时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也多已谢世了。五四对现在的人们来说,确实已经成为地道的“历史”了。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看来确有必要对有关的史实真相做一番考订。

五四时代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五四时期提出并且十分流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不仅是学术界流行的看法,而且它几乎成为近现代史的基本常识。其实,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破坏孔子这尊“至圣先师”偶像,批判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然而,只要翻阅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原始材料,以及解放前五四历史人物的有关回忆录,就不难发现:五四时代并不存在所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最早出现的说法是“打孔家店”。时间是1921年。这年6月20日和21日的《晨报》分两次刊出胡适撰写的《吴虞文录·序》一文,首次提出了这个说法。胡适在此文中赞誉吴虞是打扫“孔渣孔滓”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认为他与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批孔的共同观念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而吴虞的独到贡献是用新的方法证明了孔教所维护的“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胡适针对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所说的“这种种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的结果,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



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法制度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还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一周后，《国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收入同年12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一集四卷中。由于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颇负盛名的领袖人物，很受知识青年们的推崇，所以他在此文中所说的“孔家店”一语，很快在知识界中流传开来，并时常见诸报端。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的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出现所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据笔者涉阅所及，直到40年代中期，这个口号才在知识界中流行。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的各种五四纪念会上，著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多次在演说中发出要坚决“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可以看出，“打倒孔家店”在那时确已成为知识界相当流行的口号了。

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者不是吴虞

是谁最先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学术界有如下三种说法：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新青年》杂志；三、吴虞。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理所当然，这个口号的提出者也就肯定是子虚乌有了。因此，对于这三种说法理应均可以置而不论。但对于第三种看法，则确有探究之必要。

考查吴虞一生的著作、言论，无论在五四时代，还是在此后的岁月，从未说过“打倒孔家店”这样的言词。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会把他说成是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呢？起因在于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对他的那句赞誉的话：“‘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应该承认，胡适的这个评价是很有根据的。早在1906年，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吴虞就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过讥孔非儒的诗作《中夜不寐偶成八首》，回国后陆续在成都发表了不少反孔非儒诗文，如《李卓吾别传》、《宋元学案粹语》、《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辛亥杂诗九十六首》等。1910年，吴虞因散发《家庭苦趣》暴露其父丑行，被社会视为“非理非法”的名教罪人，成都教育总会以“士林耻以为伍”为由通过决议把他逐出教育界。1911年，因《宋元学案粹语》的《例言》中引用了李贽的语录而被清政府学部明令查禁。不久，清政府又以“为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的罪名下令逮捕他，被迫逃离成都。四川总督王人文曾“移文各省逮捕”。因为在乡下受到哥老会首领，舅父刘藜然的庇护才幸免于难。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尊孔派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吴虞写了不少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3年，成都《醒群报》因发表了吴虞的反孔



文章,当即被袁氏政府内政部电令查封。从此,他的“非儒”之作,成都各报均不敢刊载。当《新青年》于1916年发表易白沙撰写的第一篇反孔文章《孔子评议》(上)时,吴虞当即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便立刻给该刊主编陈独秀写信。信中对《新青年》发表的这篇反孔文章大加赞赏,引为同调,并概略地介绍了自己从1906年起发表的反孔非儒诗文及由此一再遭受迫害与目前在成都难以发稿的困境。此信还特别提到现在手头尚有文稿《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等,并说这些文章的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陈独秀接到此信后,立即在《新青年》上予以公开发表和作答。陈在致吴的公开信中说,他早就闻知吴虞为“蜀中名将”,并告诉吴虞当年在《甲寅》上发表的诗作是经他“选载圈识”的,热情地期望他寄来所有文稿,将分载于《新青年》、《甲寅》杂志,“嘉惠后学,诚盛事也”。由于陈独秀的赞许,以及吴虞的上述文章陆续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吴虞很快成为与早已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齐名的反孔人物。1921年出版的《吴虞文录》收集了他自1906年以来写作的重要反孔非儒文章。胡适在该书的序中认为,当时有“两位反孔健将”,一位是上海的陈独秀,一位是成都的吴虞,并称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里所谓的“只手”云云,是指吴虞在四川独自一人坚持反孔批孔。所谓“老英雄”云云,既是说当时年已半百的吴虞对一班“少年”来说,堪称老矣,也是指他的反孔资历颇深,在当时的反孔人物中是无人能比的。

不知为什么,许多论者在引用胡适赞誉吴虞的话“‘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时,都在“打”字的后边加上了“倒”字。于是便以讹传讹,吴虞既糊里糊涂地成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又在无形中成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最早提出者。大约这种推断是不错的:以后出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肯定是由胡适文章中的“打孔家店”演化出来的。由此看来,胡适倒应拥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大部分发明权了。

胡适的上述发明事出有因。他为《吴虞文录》作序时,因为要撰写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论文,正在阅读《水浒传》。此书中一再描写某些挂着酒店、客店招牌的“黑店”(其中最著名的是张青、孙二娘开的十字坡酒店),干这样害人的勾当:在酒中投放“蒙汗药”,先把客人麻醉或毒死,然后将其宰杀,抢掠其财物,并把客人尸体的肉充作牛羊肉出卖,或做成人肉馅馒头之类菜肴出卖。胡适的“孔家店”的比喻即由此而来的。这显然是在有意开孔子和尊孔派的玩笑。揶揄孔子及其道统的继承人,曾是五四时代进步知识界的一种风尚。当时的反孔者,大约为了剥去这位“至圣先师”的灵光,故意与形形色色的尊孔者唱反调,对孔子常常用孔老爹、孔老二、孔二先生、孔老先生之类的谑称,或者直呼孔丘其名。



1920年,因激烈的反孔而闻名于世的吴虞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该校国文系教授。但因讲课效果不佳受到同学冷落,尊孔派也趁机攻击嘲弄他。吴虞从此消沉、颓唐,竟然常到北京八大胡同混日子,以玩弄女性取乐,并发表以狎妓为内容的艳诗《赠娇寓》数十首。1924年4月9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又辰的杂感《介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底近著》,文中摘录了吴虞的部分艳诗。此文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纷纷投稿猛烈抨击这位昔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丑行。4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署名XY的文章《孔家店的老伙计》指出:“狎优,狎妓”本来就是“冒牌孔家店里货物”,“本是孔家店里的伙计们最爱作的‘风流韵事’;吴虞哪里是什么‘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简直是孔家店里老伙计”;“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只配做被打者,决不配做打手”!吴虞对此文的责难非常恼火,当即给《晨报》记者写信,为自己辩解说:“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同年5月2日《晨报·副刊》)既然吴虞不是“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者,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很可能是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姓名尚待进一步考证。

“孔家店”里的货色并不都姓孔

学术界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往往把这场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概括为“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又常常把“打倒孔家店”的斗争说成是批孔——破坏孔子这尊维护封建专制的偶像,揭露孔子学说以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弊害与罪恶。以上看法,同样是有乖史实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几乎都对中国传统旧文化持全面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也好,“精神文明”也好,与西洋相比,既是大大落伍的,又是弊害丛生的。中国民族之所以在人类进化中陷于可怕的落后惨境,古今中国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弊端,近现代中国民族之所以灾难频仍而不能自拔,中国人自身的精神品格之所以存在种种痼疾,都是由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与弊害酿成的。因此,他们都把全面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看做是中国民族摆脱困境、灾难走向新生、进步的唯一抉择。他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文明,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一切方面,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与全面的否定。由于孔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占据的特殊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以及当时袁世凯及其他尊孔派利用孔子、孔教达到或一目的表演,都不能不使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竭力排诋孔子与揭露孔教的种种弊害、罪恶。关于这方面情况,学术界多有论及,不再赘言。但是,人们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普遍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陈独秀一班人在反省与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弊害时,除批判孔子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外,还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儒教因素,如道家、佛教、



道教等思想的重要地位、影响与危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与外来的佛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对中国民族的危害,几乎不亚于孔教,甚至更为甚之,这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们的一致看法。因此他们在批判孔教的同时,也批判道家与佛教。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指出:“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他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首要原因是“学说之为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族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是以“战争为本位”的,而东洋民族是“以安息为本位”的。造成后者的原因是:“儒者不尚力争”;“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佛教去杀”。他还在《答李大槐》中指出:“吾国旧说,最尊莫为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礼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曰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陈独秀还认为:中国之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盖在于老庄的顺应自然、知足常乐、凡事不可强求之类教训为害的结果(《人生真义》)。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虚无主义》、《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随感录,反复强调佛老的、特别是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不仅在历史上给中国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且至今仍在贻害着国民,特别是青年。他曾致函胡适,邀请这位精通中外哲学的大学者担任“司令”,向老、佛及其他虚无主义思想发动“总攻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因激烈的反孔而名闻一时的吴虞,同样是既批孔,又批道的。他在《消极革命之老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很赞成日本人的这个看法:“法兰西人为积极革命派,中国人为消极革命派,老庄其代表也。”他认为:法国人“见政府腐败,则亟起革命,断头流血,迫不及待,以求涤瑕荡秽,保其自由,弗可须臾忍”;然而中国的老庄派却与法兰西人持决然不同的态度:老庄虽然痛恨君主残暴专制及维护这种专制的“圣人”说教,但仅仅是徒作大言而不见诸行动;至于后世的老庄派的信奉者们,面对专制与黑暗的社会现实,或是一面心怀不满、发牢骚,一面为一己私利虚与委蛇,或是独善其身,甘作隐逸之士。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化史的论著中,也一再谈到老庄思想的弊害,甚至把道家思想看做是对中国民族危害最大的消极思想。他在1926年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认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而东方文明的上述特点集中反映在“东方的懒惰圣人”——老庄的种种思想主张中。它使中国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